

2018河北文坛回眸(一)

2018年河北的小说创作以中短篇为主。老作家宝刀不老，何申《柳蝶儿》(《中国作家》2018年第12期)、李克灵《大姐》(《长城》2018年第2期)等作品透露着岁月的积淀与人生的旷达。中青年作家则是创作的主力。李延青《发小们的病》(《长城》2018年第6期)、刘建东《相见不难》(原载《芙蓉》2018年第6期,《中华文学选刊》第12期转载)、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收获》2018年第2期)、胡学文《龙门》(原载《花城》2018年第3期,《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7期等转载)等均沿着各自熟悉的道路做出了新的探索。年轻作家中,焦冲、贾若萱、王芝腾三位文学新秀值得关注。

在大地与天宇之间

——2018年河北小说扫描

□司敬雪

寻觅日常褶皱里的价值颗粒

离高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纵观今日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流,合作共赢仍然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所以,日常烟火依然是生活的主调,也依然是作家们关注的重心。他们充满温情地描摹柴米油盐表面的细腻光斑,并饶有兴趣地搜寻日常褶皱里细微的价值颗粒。

何申《柳蝶儿》把回忆的触角伸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五哥在文革中以极端的手段与家庭划清界限,最终酿成爷爷气绝身亡的悲剧。知错的五哥主动报名到最艰苦的山区插队劳动。他的恋人柳蝶儿一路上克服种种困难赶到山区与他团聚。五哥浪子回头与柳蝶儿的不离不弃,为如今备受浮华困扰的读者奉献出了一出清新的爱情传奇。李延青《发小们的病》是一篇现实题材佳作。发小张天民和逢时都得到了病。准确地说,逢时是真病,身居村主任之职却私欲膨胀,不肯为百姓谋事。而张天民是被得病。作为一个普通村民,他心中装着乡村的未来,想努力保住

周围的绿水青山。妻子和逢时却都不理解他,说他是精神病。从张天民身上,可以看出富裕起来的山民责任意识逐渐增强,开始思考乡村的今天与明天。水土《道歉的路》(《长城》2018年第6期),写柱嫂由于儿子打了曹主任的女儿,担心遭报复,千方百计要曹主任道歉,每次都被曹主任手下拦住。曹主任变成镇长,又变成副县长,柱嫂的恐惧与日俱增,寝食难安。后来曹主任被双规,柱嫂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作者以近乎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弱势群体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康志刚《阳坡村人的苦累》(《章回小说》2018年第4期)讲述了一场由玩笑引发的乡村斗殴,篇幅十分短小,却写出了偶然的破坏性与小人物的无奈感。

曹明霞等几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到女性情感问题上。曹明霞《色不异空》(原载《中国作家》2018年第6期,《中国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转载)是一篇有关社会、人生、幸福的小说,写了刘君生一家四姐妹的故事。二姐君琳常年拜佛,

三姐君兰整天为儿子的工作烦恼,刘君生的婚姻也亮起红灯。只有大姐君红似乎没有太多精神烦恼,可是日子相对拮据。四姐妹各有各的烦恼,每个人都需要精神的依托,摆脱困境是她们共同的需要。虽然《花开时节》(《中国作家》2018年第11期),讲的是被拐妇女的故事。小说一开篇,鸡秋叔说,唉,要是花里能开出女人来,鸡秋叔最终了6000块钱,买了一个16岁的广西媳妇。作者以儿童的视角,用貌似轻松的笔调讲述了被拐女孩儿在村里的不幸遭遇,更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气氛,让人不禁对女孩儿产生深深的同情。唐慧琴《好大一棵树》(《长城》2018年第6期),讲了一个叫苏芸的女性的故事。作者围绕她与富人老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勘探。苏芸也曾经想过,是不是与老宗的关系再进一步,有时又很讨厌与老宗的这种关系。作者唐慧琴一向喜欢并善于讲故事,在这个中篇里,她努力尝试突破自己,让自己的小说向内转。张红欣《孔雀草》

(《长城》2018年第6期)写了文学女青年朱或生活与工作的失意,也写了她侧身其间的文学圈的浮躁与投机。小说结尾,朱或坐在单位六层楼顶的女儿墙上,冷眼打量地面上围观的群众和昏倒的母亲,生活如此轻薄,真怪不得她意马心猿。朱或独坐楼顶是对生活的无奈,她的冷静则是对俗世的反思。

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在张国阳等作者的笔下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张国阳《乌狗记》(《长城》2018年第1期)中,李瑞生到城里打工,却发现工友们得了尘肺病,自己的妻子成了老板的情人。走投无路的他铤而走险绑架了老板,却发现老板原来是母亲的救命恩人。小说戛然而止,留给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花雨《摘牌记》(《长城》2018年第6期)比较独特,55岁的孙茂才打工竟然是为了摘掉贫困户的牌子。小说不长,却涉及一个常常被人忽略却十分重要的问题——贫困户的个人尊严。帮助弱者而行善事,但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尊严,不应该以善良之名伤害受助者的自尊。

做大与做厚

□吕国英

大者,阔也;厚者,深也。一般意义上,阔为面,深为远。从时空维度意义上言,阔具有一定幅员边界,指上下、左右之域;深有一定纵向空间,指过去、未来之境。艺术创作中,大与厚的关系,是特殊关系,也是基本关系,更是根本关系。这种关系,既反映作品样貌,又体现作品形质,亦呈现作品境界。

大与厚,是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的核心要素。大与厚既体现为两个方向、两种维度,又呈现为两种层面、两大范畴。从方向与维度上说,前者为横阔与纵深,体现视界与幽远;后者是时空与精神,体现空间与情怀;从层面与范畴上说,前者是自然与心性,呈现为万物与意象,后者是哲学与美学,体现为境界与审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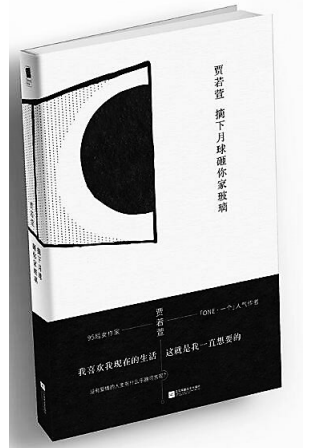
孟子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是人之境界说,也属典型的艺术境界说。就绘画艺术而言,潘天寿认为:左右上下不难,往里难。就是说,绘画创作在上下、左右表达面的方向上,向外延展都不是难题,而在表达深的层次上,向内向内延伸就难了。向内是历史纵深,向外是未来远方。兹论虽基于绘画语境,但对文艺创作诸门类,亦有普遍意义,并且这种深,不仅仅体现为内容要素,又常常作为主题思想、本质内涵、真挚情感,呈现作品思想深度,体现作品审美维度。

文艺史上,大凡成功的大家,皆在厚字上用足功夫,以厚绘写精品,以厚体现力作。轴心时代的文化巨擘是这样,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大家同样是这样。老子《道德经》,是谓内圣外王之学,被誉为万经之王,仅有五千之言;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生著就《红楼梦》;李可染七绘《万山红遍》,均于咫尺之境;黄宾虹进入浑厚华滋之境,挥写万千山水,亦在案几之内。

当下诸多文艺乱象与流弊中,好大远厚是突出现象。一段时间里,在展览呈大型、拍卖造天价、出世靠大作的炒作下,写巨制、绘长卷、拍大剧、制大作、展巨献等大作品,喧嚣一时,但往往以大为噱头,实则空洞无物、俗不可耐,污染艺坛,传播负能量。唯我独尊、极端利己主义的巨婴类创作;一味抄袭模仿、流水作业,只求耳目之娱、低级趣味的快餐式消费;热衷胡编乱写、粗制滥造,恣意胡乱涂抹、牵强附会的文化类垃圾;急功近利、极端消费受众之无奈,竭泽而渔、极致拖拉之能事的商业化运作;搞形式、弄包装、出声响的造势性动作,诸如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之症结,就是无视艺术创作中大与厚之关系,甚至将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

显然,文艺作品之构成,大为外在架构,厚是核心根本。没有厚,大无意义;欲做大,须做厚;惟做厚,方成大。

如此,做大难,做厚更难,从厚做起,艺术兴焉。



尝试小说叙事的多种可能性

讲故事并不仅仅是对既有事物的复制,更是对事物未知部分的探索与发现。所以保持对新的叙事可能性的浓厚兴趣并殚精竭虑加以实现,是一个优秀作家应该具备的艺术品格。河北作家一直关注社会现实的热情,同时也葆有对叙事技巧进行多种探索的激情。

张楚与这个时代有着天然的亲密性,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碰到时代的兴奋点。《中年妇女恋爱史》甫一发表即受到很多人称赞。他的这个新短篇,在对俗世作乡镇浮世绘的同时,通过有关年份、外星人的介

绍,有意放大、提亮了曾经作为暗部处理的宏观部分。这样一种转换,大大增强了张楚小说的繁复况味,使读者更清楚地感受到其小说存在的对于希望与爱的强烈追求和向往。其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即以此短篇为题,同时收录了《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听他说》等十余篇作品。刘建东《相见不难》,其中的人物似乎做着由天宇向大地俯冲的运动。董仙生,人如其名,一个来自空中的人物,怀着一份谦和试图理解地面上兴趣盎然的众生。小说写出的是别样的悲悯。胡学文《龙门》,评论家王春林称其充满真切的现代主义气

息,让人刮目相看。所谓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由水泥森林向草木森林求生性的精神撤退。胡学文来自大草原与大平原的结合部,原本具有一种天生的现代主义气质。他早年的成名作《秋风绝唱》是一次本色书写。他的新作《龙门》,新鲜之处在于所谓位移技巧的熟练操作。

刘荣书《少女苏沐在2010》(《长城》2018年第6期),同样显示着作者对叙事技巧的痴迷实验。小说从苏沐的恐怖入笔,耐心细致的描摹,让人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同情、疼惜。随着故事展开,苏沐心理疗痛的背

景慢慢勾勒出来,2010年那场大火及现场管理者的责任缺失引发的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反思。清寒《影印伤》(《钟山》2018年第4期),写的是一个诈骗犯的故事。作者无意讲述诈骗案的来龙去脉,她关注的是诈骗犯小麦犯罪心理的形成原因,其欲罢不能的内心纠结,以及小麦的犯罪对女儿马丢丢的影响。罪行与罪责是清楚的,让作者关注也值得关注的,是罪犯内心世界涌动的暗流及其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小说的这种叙事方式,让读者对犯罪心理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与感受。

蓬勃生长的新生力量

焦冲是位80后北漂,从事新媒体工作。作家石一枫说:焦冲的小说有着强烈的生活质感,几乎零距离地书写着北漂青年的生活,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看待当代城市变迁的视角。焦冲的新作《安妮与周艳》(《人民文学》2018年第4期,《中篇小说选刊》

2018年第4期转载),语言干净凝练,富有表现力,有鲜明的纸媒写作的特性。同时,又天衣无缝地融合了网络小说穿越、重生等技巧,通篇流贯着一股难得的生气,让笔者从中感受到填平纸媒写作与网络写作之间无形沟壑的某种可能性。贾若萱是一位90后女作

家,新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书中收录了《夜行》《他的家》《绿蝴蝶》《好运》等10篇作品,其中的青涩在所难免,无法遮挡的是文字间充盈着的细腻与分寸感。王芝腾是一位80后西方文艺理论硕士。受后现代主义影

响,她的小说有着解构主义的色彩。新作《简爱》(《西湖》2018年第1期),大概可以看作是对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同名代表作的一次戏仿。对生活麻木、虚伪现象之挺仗痛快淋漓,而如何在后现代废墟上重建精神之塔,是摆在作者面前值得深思的课题。

熠熠闪光的精神高地

——评话剧《塞罕长歌》

□门振成

三代人,55年,让沙地变林海,荒原成绿洲。这是一个英雄群体,这是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命题。著名剧作家孙德民以他深厚的创作积淀,以话剧形式将塞罕坝精神展现在舞台,塑造出一群有血有肉、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搭建起一个熠熠闪光的精神高地。

塞罕坝,1963年12月18日,北风十级,大雪,零下40度,大幕拉开,一排大字伴随着极具震撼力的音响效果出现在观众面前,狂风呼啸,雪花飞舞,白毛风野兽般嘶吼,震耳欲聋的音响,栩栩如生的画面,把观众带回当年的塞罕坝。

风雪里,众人救活了冻僵的主人公佟保中,他却要下坝当逃兵。这是怎么回事?此时,伴随着观众的疑虑,大画卷的旋律回响,塞罕坝精神的动人画卷由此展开。该剧的第一场戏,剧作家巧妙地用李场长、杨总工程师举家上坝安营扎寨,与佟保中和秦海生因妻子重病、老母病危欲离坝下坝这一

上一下的矛盾冲突步入主题。最终,李场长、杨总工程师、佟保中、秦海生,以及放弃高考上坝造林的一群青年学生围坐在一起,大家共赏电影《上甘岭》。经过一番情感的碰撞,佟保中、秦海生们坚定了守住塞罕坝,决不撤退的决心。

这样的安排使得佟保中们的思想转化,在顺理成章中进行,没有枯燥的说教和生搬硬套的戏剧模式。尤其令观众意想不到的,是旋转的舞台凸显出一块高地,两根木杆间挂上了小银幕,舞台上,大家一起重温电影《上甘岭》的精彩片段。小银幕上,坚守上甘岭阵地的战士们满怀激情地喊道:党交给我们这块阵地,一寸也不能撤退!当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响起时,一台上台下群情振奋,掌声如雷。百感交集的佟保中突然上前紧紧握住李场长的手,激动地说:我要像上甘岭的战士一样,守住塞罕坝,决不撤退!第一代务林人的长歌由此缓缓奏响。

佟保中的妻子病逝,他把刚满一岁的儿子佟刚抱上塞罕坝,让别人代养,自己没日没夜地在冰天雪



地里干活,用手扒开冰冻的树坑,手指甲都冻掉了;风雪中,19岁的技术员高志在运树苗的过程中不慎跌进雪窝子,两腿冻僵,为了不让树苗冻死,他让人拉着树苗快走,自己却冻死在冰雪中;从北京林科院来的总工程师杨宁先,带着家人

举家上坝,当他因腿部骨折回京治疗时,得知林场遭遇旱灾,12万亩松林倒下,硬是逼着女儿用轮椅把他推回了塞罕坝;当年曾在塞罕坝打过游击的老场长李斌,在林场遭灾后的三个冬春,硬是和家人们一起补种上了50万亩松林,临终前他感

那一刻,台下掌声雷动。第三代务林人的故事,聚焦在佟刚的儿子佟小林身上。从林学院毕业后,佟小林回到塞罕坝任分场场长。他要突破前人没有解决的难题,在石质阳坡上种植樟子松。妻子舒纹自作主张要将他调到省林科院工作,

为此夫妻俩产生了矛盾。杨宁先的女儿、北京林科院博士杨娜,为了解决林场的技术难题,从北京回到坝上落户。这件事使舒纹深受触动,她又回到丈夫小林的身边,与大家一起共建绿色家园。

这三代务林人,第一代的责任和信念,第二代的坚守和理想,第三代在幸福和希望中树立新的目标,都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可以看出剧作家在寻找和编织这些群像人物的生活经历、情感纠结和精神风貌的过程中,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面去表现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以先进事迹为线索,重新走进生活,走进人物,找到让观众信服、有血有肉的时代楷模的形象。

在全剧尾声的巨幅影像里,剧作家着意再现了浩瀚林海的壮观景象,再现了林海的生态价值,再现了2017年联合国地球卫士奖颁奖时的动人场面。这些场景无不宏伟庄重,震撼人心。走出剧场的那一刻,《塞罕长歌》的动人旋律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部话剧作品无疑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感人事迹做出了最好的艺术诠释。